第 一 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转折,一方面废止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口号,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 ” 后党和国家工作徘徊前进的局面；另一方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强国之路。

第一节　转折前的徘徊

1976 年粉碎“ 四人帮 ”的胜利,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 ”，党和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九亿中国人民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深重灾难，迫切要求纠正长期以来的“ 左 ” 倾错误，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但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少数中央主要领导人，却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 两个凡是 ”的方针,由此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造成了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之前党和国家工作步履维艰、游移不定的徘徊局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文革”结束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内外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医治动乱创伤，改变国家面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既为我们实现这个要求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又使我们不得不在转折伊始，先要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深重灾难和严峻局面。

就国际政治形势而言，70 年代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虽然仍在继续，但其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 1975 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失败之后，为确保战略重点，着重加强了对西欧的防务。与此同时，苏联随着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明显增长，虽然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在远东地区派驻重兵，威胁远东安全，支持别国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但其战略重点仍放在欧洲，仍放在和美国相抗衡。总之，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一定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就为刚刚从长期政治动乱中走出来的中国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就国际经济形势而言,当中国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被拖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以原子能、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利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并且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尤其是与中国毗邻的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中国大陆周边的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也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和国家,被称作“亚洲四小龙”。而此时的中国,面对身边发生的重大变化，颇为自己浪费的时间和蒙受的损失感到痛惜。本来是在经济、技术、文化异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

社会主义,经过近 30 年的艰苦奋斗，国家面貌已经大大改观，但此时不仅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而且同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显得大大落后了。在这样的形势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已经成为时代的使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就中外关系而言,虽说在‘ 文化大革命 ’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曾一度受到冲击，但在中后期，却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71 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此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得到普遍承认。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进入新的时期。在此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中国与 90 多个国家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国际环境趋于正常化。70 年代后半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外市场骤然缩小，生产设备大量闲置，他们强烈希望能够扩大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由此打开中国市场，转嫁国内危机。至于中苏关系,虽然在整个 70 年代都无明显改善，但中苏边界谈判一直在进行，中国顶住了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长期保持住了边界的相对平静。与此同时，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双边交往日益密切，贸易总额逐年上升。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参与到广泛的国际事务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就国内形势而言,当时刚刚粉碎‘ 四人帮 ”,结束‘ 文化大革命 ”，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百业待兴，冤案成堆，问题成山，就是当时中国的准确写照。

从经济上看，十年动乱造成国民生产总值的损失达 5000 多亿元，国家财政状况严重恶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在农

村，许多地方出现了“辛辛苦苦干一年，只够柴米油盐钱”的状况;在城市,职工的人均收入十年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 1965 年的 625 元下降到 1976 年的 605 元。

从政治上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相继肆虐，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残酷迫害，留下了大批冤假错案。十年间，全国 17.5% 的国家干部曾被立案审查过，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就高达 75% ;仅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举的受诬陷、迫害的就有 729511 人之多,迫害致死的达 34800 多人。落实政策的任务极其繁重而艰巨。

从思想理论上看,林彪、‘四人帮’一伙十年来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教条主义盛行,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猖獗。同时,长期的‘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也深深地影响着广大干部和群众，造成不少人思想僵化,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之‘文革’中倡导‘造反有理’,盛行‘大民主’和无政府主义,这也对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严重削弱和干扰着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从科教文艺上来看,这些方面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由于林彪、‘四人帮’提出教育战线‘两个估计’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全国绝大部分学校、科研院所、文教机关和群众艺术团体不能正常运转。他们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九亿人民只能看几出样板戏，只许听有限的革命歌，文化生活极其单调贫乏。与此同时，他们把数百万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了“臭老九”的另册,给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等扣上‘资产阶级

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致使其中不少中华民族的精英因此而含冤于九泉之下。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我们在走向新时期之初，必须首先集中精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分清理论上、路线上和方针政策上的大是大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拨乱反正，及早走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拨乱反正中遇到的困难

面对国际形势提供的新的机遇和挑战，顺应广大人民群众集中力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强烈要求，从 1976 年 12 月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三次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材料，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伟大历史转折前拨乱反正的序幕。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人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也是党的工作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迫切要求纠正这种错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这种要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集中表现在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件事上。但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却背离人民的意愿，采取了继续坚持“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态度。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 1976 年 10 月 26 日，他在听取宣传口汇报之后，针对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明确表态：1. 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2. “四人帮”的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3.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话，点过头的事，都不能批评；4. 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就是华国锋同志“两个凡是”思想的最初表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77 年 1 月 8 日，全国各地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群众性活动，并再度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对此，华国锋同志采取了压制态度，并且指示写作班子把他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这样，在 1 月 21 日的讲话草稿中，就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言词。1 月 25 日，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同志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把人们对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习文件，不谈这些问题。根据华国锋同志的这个意见，2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针对性极强地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在当时以最具权威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出现，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华国锋同志对待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以至治理整个国家的态度和方针：一切都不允许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党和国家还要按以前的路线走下去。

“两个凡是”的方针出台后不久，1977 年 3 月 14 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强调，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

果。在对待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他不仅继续认定是“反革命事件”，而且还指责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是完全错误的。在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上,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为了论证继续批邓的必要性，他硬把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同“四人帮”余党妄图翻案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到一起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等等。他再次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使全国迈向新时期伊始又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首先，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受到了阻碍。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难以出来主持工作,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的平反昭雪，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尚无法调动起来，整个社会仍然处于沉闷的氛围之中。

其次，原有的个人崇拜得到维护，新的个人崇拜不断加强。按照‘两个凡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只能继续维护,不能有任何削弱，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也只能继续坚持，不能有丝毫动摇；与此同时，华国锋同志又凭借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作为毛泽东同志指定接班人的合法资格，备加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以期由此巩固他的领导地位，获得与这一地位相称的领袖权威。这样，1977～1978两年间“英明领袖”、“统帅”等闪烁着神圣光芒的桂冠都戴到了华国锋同志的头上。

“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幅作为对联贴在了中国老百姓的门上,华主席的画像与毛主席的画像并排挂在了众多中国人的厅堂里,歌颂华主席、热爱华主席、忠于华主席、保卫华主席成为群众大会必选的标语口号。新的一轮个人崇拜初露端倪!

再次,国民经济恢复,出现“洋冒进”的新的失误。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推行,党未能及时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致使在“文革”中表现得极为显著的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不但没有受到批判,反而以其更为强劲的作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使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出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倾向。从 1976 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同志就提出要在 4 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1977 年 4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进国民经济新跃进》,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具体阐述了华国锋同志提出的“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强调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12 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下达的《关于 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又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各个生产技术领域多数接近、少数赶上或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按照这个规划,到 1985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原油产量达到 25 亿吨,粮食产量达到 4 亿吨 规定十年中工业方面要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型项目,其中有 10 个大型钢铁基地、8 个大型煤炭基地、10 个大油气田、30 个发电站等。这些显然都是不合实际的高指标。按照这个《纲要》执行下来,1978 年的基建投资成为“大跃进”之后 20 年中基建投资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大大超出了当时国力的允许范围,造成了国际收

支中严重的逆差，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加重了国家财政困难。

第二节　转折的思想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华国锋同志的“两个凡是”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大障碍。对此,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阐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发表，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遍及全国，由此开始了冲破“左”的束缚的思想大解放。这样就为伟大转折的实现进行了思想发动，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一、大讨论的孕育——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

华国锋同志的“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使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深感忧虑。他觉得“两个凡是”不是个一般问题，而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个重要的思想路线问题。他经过反复考虑，再次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直率挺身而出,于 1977 年 4 月 10 日给党中央写信,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 月 24 日,他在同王震、邓立群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 1976 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

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①] 邓小平同志正是通过这次谈话,率先对华国锋同志在三月中央全会上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了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批评,由此带动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

正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推动下,1977 年 7 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无疑是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彻底从思想上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这次会议的闭幕词中,他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②] 接着在 8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烈呼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虽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这样的倡导和呼吁,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基础,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市场,尽管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局部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8～3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3、45 页。

的进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围绕着这些问题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和激烈，“两个凡是”的观点在一些问题上还占有优势。这集中反映在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他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却认为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虽然对“四人帮”的不少谬论和倒行逆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但却仍然坚持并阐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观点；他仍然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这就说明党的十一大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召开的，但仍然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两个凡是”的思想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仍占有支配地位，要冲破它的束缚，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想发动。

二、大讨论的引发——（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

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最初并未见分晓，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继续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也在深入思考。斗争和思考促使人们日益接近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这种接近最早反映在 1978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张成的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之中。这篇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是科学的结论，是人们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评论还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有的同志不愿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标准。’应该说，这篇评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它虽然只有 1000 余字，发表的位置也很不起眼，但就这样，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陆续收到 20 多封读者来稿、来信。可是，其中只有一封表示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其余均表示不能接受或者不能完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接受这一观点。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央高层的争论和斗争已经引起理论界和部分群众的关注和参与；另一方面也说明，要全面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还急需进行一场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顺应这个需要，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这篇文章共分四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联系到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情况，强调指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击，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接着说："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敢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

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伟大的新长征。”

《标准》一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讨论就此展开了。

三、大讨论的展开——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标准》一文的发表,首先引来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5 月 12 日,即《人民日报》转载《标准》一文的当天,《人民日报》负责人就收到一个指责电话,说《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错误’。次日,《红旗》杂志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尔后还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 月 17 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同志点名批评了《标准》和另外一篇文章，说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5 月 18 日，当时的中宣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大家对《标准》一文‘议论纷纷,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6 月 15 日，汪东兴同志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对《标准》和其他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还特别对负责审定《标准》一文的胡耀邦同志点名批评，要他在报上写文章时注意。他还说到，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那么恰当。他认为，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了不得的事。而此时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遵照华国锋、汪东兴等同志的意见,对《标准》一文一直保持长时间的沉默,以此表

明其抵制的态度。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的态度正受到广大群众的责难时，汪东兴同志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面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标准》一文的指责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压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他又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问题了，真是莫名其妙。”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

放”。[①] 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即以“邓副主席精确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作了报道，这就使邓小平的讲话成了一把锐利的思想武器，有力地支持了面临困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极大地鼓舞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增加了他们继续斗争的勇气。7 月 21 日，邓小平同志同当时的中宣部长谈话，要求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9 月 9 日，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发表讲话，也表示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来检验。 9 月 16 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14、119 页。

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①

当中央高层围绕《标准》一文的发表及真理标准问题展开激烈论争的时候，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支持中受到鼓舞，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展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78 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 650 篇之多,由此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大讨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场热潮中，全国大多数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大军区领导机构都相继进行了讨论，许多省委及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撰文或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且高度评价这次讨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争鸣问题了，而是成了一个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197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会议认为,《光明日报》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华国锋同志也表示同意这种看法，汪东兴同志也没有表示异议。在中央高层初步统一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认识之后， 11 月 14 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26、128 页。

动，对于在那场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至此，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提出的最迫切的两大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都基本上得到了实现。这无疑表明，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正确的思想已占据优势，僵局已经被打破。

四、大讨论的结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被肯定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中共中央于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上，代表们再次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11 月 27 日，一位代表在分组讨论时发言，表达了他对真理标准问题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不同看法。首先，他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虽然他承认这样的讨论是有益的，但又担心讨论会冲击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做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去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会议的讨论议题已逐步转入经济问题，但这篇发言又把与会人员的注意力拉回到了政治问题上，“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争论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对于似乎已近尾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又发生了新的重大影响：其一，它将真理标准问题集中提到与会的 200 多名中共高级干部面前，使此前对这场讨论曾予以热情关注及未曾重视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及中央、国务院的部门负责人又一次交流和探讨这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